

理论探索

大文学观与读者意识

王佐红

近年来,我们逐渐发现,纯文学内部的“卷”越来越没有大的意义了,因为挑战不光在内部,危机已从外部而来,与文学争夺注意力的竞争性力量越来越多了,注意力资源被稀释得越来越薄了。然而我们对外部问题的解决,没有办法单纯地从外部解决,我们还得从内部着手,不断提高新时代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能见度与对广泛受众的吸引力。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是杂文学观,文学承担着丰富的社会功能。但是,今天的文学所承载的功能似乎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文学似乎变得越来越“纯”了,受关注度也就越来越低了。今天,我们推举大文学观,是试图让文学有力地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这种文学应该包含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更深刻的生活洞见,具有更新鲜的文学表达、更开放且引起共情的内在力量。

由此,作家应该有更大的关怀。譬如鲁迅,他不是为了写出文章而写,他的一切行文实质上都是为了争取民族的光明未来。这是我们当下多数作家与鲁迅的差距。我们不能为了文学而文学,我们的文字背后应该有力透纸背的家国情怀。基于这样的目的,文学也不一定非得是“以文字写就的文学”。它可能以文字为母本,延伸出许许多多的“变体”,抵达更加广泛的受众。因此,未来的文学可以更多地与声音、动作、形体等结合起来,被人们充分“运用”起来。

以前,我们老说一个词——“曲高和寡”。的确,很多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探索性、先锋性。这样的作品想要广泛地抵达受众,确实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随着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样的困境会越来越少。我们要始终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优秀的作品最终都会被读者挖掘出来。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涌现出更多雅俗共赏的作品,真正做到专家认可、人民喜爱。

今天,在大文学观的引领下,专业创作和新大众文艺需要更好地融合起来。比如,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相向而行的融合与新生,如何进一步推进?至少纯文学在不让渡深刻性的前提下,向情节化、戏剧化与开放性、共情性迈进几步,定会有更好的接受效果。写作者需要深入思考:我们当下的写作对历史、时代和现实有什么意义?对人类未来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思考,更加有效地表达出来,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在我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是雅与俗、深与浅、朦胧与明亮、繁复与简洁的合奏。

这样看来,我们提倡“读者意识”,并不是为了迎合读者而写作。迎合,意味着放弃主体性的引领,将写作者的判断力让渡给市场中浮动的趣味;而真正的读者意识,恰恰是写作者以最大的诚意和最强的能力,去邀请、去激荡、去叩击那些潜在的、尚未被言明的心灵期待。它要求写作者在动笔之前就问自己:我所表达的这个困境,是否也是他人内心的困境?我所书写的这份喜悦,能否在另一颗心灵中激起回响?这是一种精神的扩容,让个人的私语获得公共性的质地,让私人经验在叙事的淬炼中变成可能被普遍理解的情感结构。

我们所提倡的大文学观,呼唤一种“大循环”的意识。这意味着,文学不能只是在作者、编辑、评论家的小圈子里流动,而是真正广泛地流入到读者之中,嵌入到时代生活的大潮之中,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不能只是在文学传播的环节上发力,更要在优秀作品生产的环节下功夫。有好的作品,一切才能水到渠成地发生。

所以,作家需要在写作实践中思考:如何在保持语言品质的前提下,让叙事具有更强的牵引力,使读者愿意进入文本的世界?在面对多元分层的读者群体时,如何保持足够的包容性与对话性,让作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输出,而成为某种公共讨论的起点?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观念变革。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一个必须且必然的过程。值得欣喜的是,当代中国作家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文学规律、时代症候的观察与思考,没有放弃过对文学写作路径的探索与开掘。正因此,文学是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的。

(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声音

中国传统文化的听觉认知和审美本质是我在《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一书当中深入研究论述过的问题。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同于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感官抉择创造出了以“和”为核心的礼乐文化,并生成了中国文化敏感、安静以及谦逊的品质。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意境”概念,从来不只是强调某种画面和景象的视觉性体验,而是指向一种听觉美学。否则,它不会被叫作意境,而该叫作意景了。境与景的差异取决于欣赏主体的位置和立场。对于境而言,欣赏主体是在立体空间里的,其身心是沉浸式的,主体同环境相互交融,连为一体。对于景来说,欣赏主体往往与景是对立的,有着明确的主客体分界。也就是说,景一般是作为二维画面呈现于主体眼前,它并不在意此刻的整体环境。尤其不同的是,境的场域里具有一种声感动机制,而这恰是景里所缺失的。

声感动是伯吉特·阿贝尔斯和帕特里克·艾森劳尔在2025年出版的《氛围的知识》(Atmospheric Knowledge)一书里提出的重要概念。所谓“氛围的知识”或者说“作为氛围的知识”就是在声感动这一动力学基础上形成的。书中的引言部分这样介绍:“海洋关联与声感动是我们调研氛围知识的主要线索。从我们在本书中采取的现象学视角来看,氛围即是被注入空间的情绪感受。它们能够经由本能直观体验以及躯体与世界的交融互动得以感知。《氛围的知识》是一位音乐学者与一位人类学者的合作项目,二人分别从各自的路径汇聚到了民族志研究导向的氛围这个主题上来。”氛围在他们那里被界定为环境性的和场域性的。

不过,这两位学者指出,声感动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听觉感知的产物。实际上,它是声音和其他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作为“振动实践”超越了单纯听觉感官的能动,所以不可以被简化为单一的感官模式。换言之,氛围知识的形成需要多种感官的协同合作,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一句话,氛围是非语言的和具身性的知识模式。借用氛围知识这一学说,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意境概念的美学内涵。

景的视觉性诉求显然没有境的那种氛围性。然而,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最先于1960年代开始研究声学环境的加拿大音乐家R.穆雷·谢弗仍将自己的著述命名为《新声景》,却不是《新声境》。数年后,谢弗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一部相对更为系统的学术论著,仍然以《声景学》为题。不过,论著的副标题“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却已然明确告知我们,他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声音

声景还是声境?

路文彬

环境,他在此所说的声景即是声境。不难看到,谢弗在书中论及的全部内容不外乎是自然和人文两大范畴的声音环境。他所研究的不是声音的景观抑或画面,而只是声音同环境之间的互动效应。虽说后来艾米莉·汤普森在2002年出版的论著《现代性的声景》里特意强调自己在声景概念的使用上和谢弗略有不同,她将声音景观定义为“听觉景观或倾听景观”。但是,声景也好,听景也好,关注听觉对象也罢,关注听觉本身也罢,他们两人的概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都不过是把立体环境进行了单一视觉化的处理,从而疏忽了对其他感官的考量。

与此类同,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领域,不少学者也是未能脱离视觉中心思维模式的束缚,习惯于将听觉作为叙事加以分析,这其实也是对听觉所实施的无意识视觉化收编。法国学者皮埃尔·沙费曾在其《音乐客体论》中论述过,声音是不具有叙事性的。听觉不注重逻辑秩序,也没有明晰的所指性,其所谓叙事性必须是同视觉形象绑定在一起方有可能的假象。有鉴于此,听觉叙事研究者们特别倚重声景(音景)、聆听等这些具有视觉属性的术语。表面上看来,他们研究的是听觉,但此处的听觉几乎同情感、时间和身体没有任何联系。听觉在此只是被视觉绑架的监控对象,属于视觉感官的傀儡。只有彻底认清这一真相,我们才能回到听觉本体层面的研究,回到声境学上的研究。

要想回到声境学上的研究,首先应当秉持的是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姿态即对话的姿态。它不像视觉那样总是以对立为前提,而是在协商的意愿前提下,先行保持沉默。这一沉默是对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官的接纳。正像《氛围的知识》中所写的:“同样,在声音这里,没有能够完全脱离离人的个体。声音知识因此催生出生一种兼具生态性与伦理性的认知观念,即万事万物彼此联结……”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声境学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回到本土文化传统的研究,更意味着一种去知识殖民化的研究。此外,它的具身性或者说拟具身性也会促使我们同自己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有益的共情关系。

总之,与其说声境概念的主张是单纯基于对视觉的反动,毋宁说它是为了祛除文字之于语言的遮蔽,进而以现场重构的方式重新找回身体的鲜活感知。至此,知识不再是制造距离的理念,而是建立联结的格物。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注

毕业致辞中的清醒与温情

张林轩

◆2026年毕业季,许多人文学科的老师在毕业致辞中悄然搁置起那些体面又美好的祝词。他们以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向即将走出校园的人文学子们预告着与校园生活完全不同的未来。学生们并不意外,他们清晰地感受到,这是一个人文学科面临极大挑战的时代

◆人文学科最珍贵的馈赠,是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同时赋予人“应万变”的能力与“守不变”的底气。只要仍有敏锐的心灵在执着地追问着答案,技术的变革即便再迅猛,人也终不会像海滩上的图案那样被浪潮抹去

巨变远远甩在身后。形形色色的“文科无用”论因此不断发酵、扩散。但事实恰恰相反,变化越是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文学科的价值越是不可替代。人文教育的精髓,从不是授人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在于教导人们“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在专业训练中,这种观念落实为对文本不厌其烦地细读,对常识穷追不舍地发问,对现象背后隐秘幽微的人情世理“仰观俯察”式地体悟。在训练中所养成的思维习惯与方法,在面对世界这个大文本时,会化作“从内心出发允许一切发生”的胸怀,“用一种更细致、更诚实的方式去理解现实”的能力,“迎接变化、驾驭变化”的智慧,以及“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汇聚在一起”的力量。如果失去这些内核力的定向引领、居间协调与内在安顿,变化要么成为保守者眼中的洪水猛兽,要么沦为投机者眼中的牟利风口。而人文学科赋予我们的,则是一种从容且坚定地居于变化“之中”的能力,向外铸就对变化之细微肌理的洞察力与判断力,向内涵养在环境震荡中依然保持定力并积极创造的能动性。

与此同时,人文学科也始终帮助我们锚定变局之中的精神根基。伴随着AI的强势发展,许多曾专属于人的领域发生松动,人类主体性的内涵与边界亦开始被重新审视。当强大的算法空前地挑战着人以理性为万物立法的权威,甚至当AI生成的各类文艺作品开始露出一抹“人情味”时,我们所感到的不只是就业岗位被替代的焦虑,更有在技术面前再无秘密可言的不安,从而呈现为一种在冰冷数字面前的怅然。然而,我们也始终带着一份“执拗”生存于世,希望保持自身区别于他者的“几希”之异,并以此为基础在人与人与人之间维系着一种不足为外物道的默契。这份“执拗”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文学科不断向人性深处探寻的内生动力,指引它穿透语言、历史、逻辑的层层帷幔,一次又一次地直面并守护“人之为人”的尊严。

当与那些愈发强大的新兴智能体比肩而立时,我们身上仍然闪烁着诸多的光辉:可以是“根植于身

体、生活、人生的具身经验”,即用肉身与思想共同丈量世界的独特方式;可以是沉甸甸的“责任”,即对每一次选择与行动必须有所担当的伦理责任;可以是“绵延不息的情感、情义和情怀”,即在文脉薪火中滋养人心、联结彼此的精神纽带;亦可以是“手搓”式的思想底色,即以亲身运思、反复叩问打磨心智的理性品格。答案永不唯一,但只要仍有敏锐的心灵在执着地追问着答案,技术的变革即便再迅猛,人也终不会像海滩上的图案那样被浪潮抹去。

如果将目光从时代的宏大叙事下沉到每一段平凡却鲜活的人生,人文学科的力量则更显温厚绵长。毕业后,学生们即将面对的最重要也最棘手的课题就是“生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跃力说:“当你学会庄重地对待每一个朴素的日子,你就拥有了抵御人生风雨的第一层铠甲。”透过人文教育所打磨出的“纯真之眼”,我们才能更好地感受和把握一个个鲜活的“当下”时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阮蕊表示:“人生的答案很少在巅峰时刻,更多是在那些看似无用的停顿里——在失眠的夜里忽然释怀的结,在火车上看向窗外风景时掉下的眼泪。”因此,像细读作品一样解读人生,像深入字里行间一样去触摸生活的每一寸肌理,像共情虚构人物一样感受身边的众生万物,像赏析情节的“突转”与“发现”一样去理解生活的波澜起伏,每种经历和遭遇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好”处。

在《庄子》中,庖丁在向文惠君分享自己的解牛之道时,讲罢那出神入化的游刃有余境界,却突然话锋一转,说:“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大意是说,庖丁虽然技艺已经很高超,但每当遇到筋骨交错集结的地方,他还是会感到棘手,因此会格外警惕,目光专注,动作谨慎,最后才轻刀慢解,圆满收工。对于初步走向社会的学子们来说,尤其需要这样一份“游刃有余”的技巧和“怵然为戒”的心态,从而在深入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一个个“难为”的时刻不断探索人文学科的“能力”与“当为”。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书评

在文本细读中勾勒出左翼文学的发展步履

——评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想象、叙述与精神流变(1927—1949)》

章昌琦

新世纪以来,左翼文学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陈红旗是20余年来左翼文学研究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他从世纪之交跟随刘纳、陈方竟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起,就涉足左翼文学研究,并陆续推出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2010)、《中国左翼文学的演进与嬗变》(2015)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与左翼文学的互动相生》(2016)、《中国左翼文学的想象、叙述与精神流变(1927—1949)》(2025)等著作。他不断地在这个领域耕耘,所以,熟悉大量的左翼小说。和他闲聊时,我感受到,读左翼作品不仅仅是他的专业工作,而且已经成为他的人生乐趣。不同于运用大量理论进行阐发的研究,陈红旗在进行左翼文学研究时,注重立足于文本,在密匝的左翼作家作品的举隅、阐发之中逐渐构筑起左翼文艺发生、演进的历史化脉络。

在《中国左翼文学的想象、叙述与精神流变(1927—1949)》一书中,陈红旗把研究的重心进一步放在了左翼文本的自足性上。他认为,“(左翼文学的精神)植根于社会现实批评和大众命运观照之中,反映在对其自身艺术真理的追求之中”。这种“艺术自律性”是审美的,亦是建构历史审视、现实批判与远景想象的规约。因此,左翼作家们在时代性的主题与题材之中,在“我们”的集体主义诉求中,不断探索革命政治当中的文学性。作家们尝试熔铸革命与人生、政治与生命、历史与想象,在文本叙事与家国危机、革命政治之中探寻契合点。在左翼文学研究史中,左翼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一直受到关注。陈红旗在其具有连贯性的研究中始终终致于直面这一整体的诘难。他既深入文本

分析左翼文学的“艺术自律性”,也不断地考察外部的话语影响,在更广义的左翼文艺运动史、报刊媒介史乃至社会史当中来观照这一“艺术自律性”的时代内涵。

对左翼文学发生、演变的历时性脉络进行深入考察,是陈红旗左翼文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王瑶先生明确提出“左翼十年”的划分,李何林、陈瘦竹等学者的左翼文艺运动及史料研究也都达成了左联史(或者说左翼运动史)分段的存在共识,所以学界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分期的探讨并不存在太多分歧。陈红旗在其著作中延续其对左翼文学演变研究的热情,独具新意地在左翼作品内部挖掘其发生、高潮、落潮的“符码”。他立足于艺术自律性的规约,重新介入丰富的文本叙事,去爬梳左翼“叙事模式和形态特征”的历史阶段性衍化。也就是说,陈红旗的左翼文学发展阶段研究,并不只是基于外在的社会发展史,而且基于文本内部的叙事逻辑转变。《中国左翼文学的想象、叙述与精神流变(1927—1949)》立足于革命伦理、阶级表达、生死感悟与“力的文艺”等原初性命题,分析左翼文本内部的主题超越、悲愤的抒情质素,彰显了一种直观的生命体验。

当卷帙浩繁的1930年代左翼报刊与文本被置于案头,陈红旗选择沉入文本和材料之中,去梳理其内在的逻辑演变。当然,回到文本,并不意味着就是摒弃外部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资源,而是抛去所有的成见、定见,在历史的深描中重新把握左翼文本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联,探索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话语和思想认知。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